

新民晚报·特刊

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

2007年8月7日 星期二

1927-2007

在陕西蒲城,为标准时间“站岗”的守时兵
终日与“滴答”声作伴,出现了“特异功能”——

生物钟自动“拨”到北京时间

君友

北京时间产自蒲城

蒲城虽说是个普通县城,却是中国版图的几何中心,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就坐落在这里,作为国家主权象征的北京时间正是从这里发向全国和世界各地的。从1969年起,这里驻守着一群“守时兵”——武警陕西省总队三支队六中队的官兵。

由周恩来总理1966年3月26日亲自批准的授时中心,是我国唯一的标准时间授时中心。这里测报的北京时间在30亿年里误差仅为1秒钟。从送卫星上天到为卫星导航,从核潜艇水下发射到运载火箭升空等大事,都与官兵们守卫的北京时间息息相关。

出西安城北行,过蒲城县城,远远望见塔架林立,“时间城”到了。这里只有孤零零一个院落,三中队营房在院落一角。绕过4座206米高的天线支撑塔,就到了“时间城”的核心:铯原子钟室。铯原子钟其貌不扬,可它是时间计算的核心,它的运行精度和稳定性居国际领先水平。

在短波和长波两套授时系统的控制室,带班警官郑爱民自豪地说:“铯原子钟计算出来的时间,通过这里发射到全国和亚洲地区,用户同步精度达到微秒,不但能准确报时,还为火箭发射、卫星导航等尖端科技提供标准时间和频率。”

“滴、滴……
叮! 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××点整。”这句熟悉的话语,伴随着每个中国人度过一天又一天、一年又一年。

提起北京时间,无人不知,无人不晓,可问起北京时间的测报地,大概不少人会认为是北京,其实不然,它的测报地是陕西渭北高原上的一个普通县城——蒲城。



■ 守卫在授时中心长波授时台的战士

电磁波搅乱生物钟

走进官兵宿舍,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:宿舍里所有的床都是头朝北、脚朝南摆放的。这是怎么回事?原来,这样有助于帮助官兵们克服失眠。

受授时中心电磁波的影响,每个人初来乍到,都会出现自身生物钟高度混乱的状态:吃不下饭,睡不着觉,心里特别烦,往哨位上一站,两条腿像灌了铅,抬都抬不动,所

以,战士们上哨要过的第一关就是瞌睡关。平时还好,到了周末,不是还没开饭就早早来到了饭堂,就是睡醒不来错过了开饭时间。

有意思的是,跑到这里来的兔子和老鼠都打起了“醉拳”,分不清方向,被称为“识路高手”的鸽子飞进这里,也很难再飞出去。晚上11时以后,受短波发射的影响,中队院子里所有的金属都带上了7.8伏的电,要

是拿一根日光灯管站在院子里指向天空,灯管就会闪闪发光。

为了解除这些烦恼,官兵们找来人体生物学和医学书籍研究,又向神经专科的教授专家请教,终于找到了原因。原来地球的磁场是南北走向的,人如果东西方向睡觉,磁力线在身体上横向切割,就会产生微量的生物电,破坏自身平衡,容易导致失眠。如果把床的方向摆成和地球磁力线一致的方向,失眠头晕的情况就会大大缓解。

电磁波的影响消除以后,大家不但能睡着觉了,还增添了一种“特异功能”:每天听着哨位上传来的“滴答”声和最近距离的标准时间、标准频率播发声,大家自身原有的生物钟逐渐被打破,不知不觉间成了北京时间的化身,走到哪里就把北京时间带到哪里。

我们还发现一个有趣现象:这里的老兵没有一人戴手表。原来,中队战士常年守卫在长、短波台旁边,清晰有规律的整点报时声和每时每刻的发声,已经让他们体内生成了一个“生物钟”,手表显得多余了。只要你问时间,任何战士都可以脱口报出,误差不超过5分钟。

时间,在中队是精确到秒的。在中队呆得最久的兵张福田,每年都会给新兵算一笔时间账:义务兵在中队服役2年是63072000秒,按每天上一班哨计算,每个人在哨位上的时间只有5256000秒,只占1/10不到。这样一算,大家的时间意识就被激发出来,不论站岗执勤还是出差休假,从来没人弄错过时间。

中队俱乐部里挂着一块用子弹壳做成的“钟”。290颗子弹壳组成表盘,时针和分针指向9时05分,上方用红字围成一圈,组合在一起就像地平线上喷薄而出的一轮红日,它代表了大家的心声:祝愿祖国的明天更美好。

(《解放军报》供本报专稿)

老兵不用戴手表

赵瑞卿

炸弹飞来

从上海解放的那日起,敌人就处心积虑地破坏上海,他们叫嚣:“共产党打得下上海,但是管不了上海。过不了3个月,它就会变成一个‘黑上海’、‘臭上海’。”在美国的支持下,国民党军一边派遣大批匪特潜入大陆伺机破坏,一边出动飞机骚扰和轰炸上海。

1949年7月,我所在的解放军297团三营九连接受了守卫杨树浦发电厂的任务。

1950年2月6日,17架美蒋飞机飞来袭击闸北水电公司、杨树浦发电厂、南市华商电器公司等,投下了67枚重磅炸弹。

那天,吃完午饭,我和指导员、副连长正在研究工作,通讯员小李拎着水壶进来,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警报声。警报声越来越急,我们按照预定计划,由副连长吴世清同志带一、三排疏散防空,指导员和我带领二排和机枪班,在厂内负责警卫与抢救,并通知对空射击组严密监视敌机的动向。同时,我们派出两个班加强厂内巡逻,指导工人开展防空和救护工作。敌机从我们头上俯冲而过,发出刺耳的轰鸣,接着就是几声巨响,大地抖动,砖石乱飞。我急忙拿起电话耳机,想

解放后不久,国民党军出动飞机轰炸上海的重要设施,解放军和工人们用生命共同护卫城市正常运转——

杨树浦发电厂被炸之后

与营部通话,但电话不通了。就在这当口,一枚重磅炸弹落在连部楼房旁边,我很快失去知觉。

身受重伤

当我醒来时,周围一片漆黑,我只觉得胸闷疼痛,呼吸困难,这时才明白,连部的房子已经倒塌,幸亏几根木棍恰好落在残垣上,才没有把我压死。

我使劲向上拱了几下,动也不动。我着急了,心想,电厂炸坏了没有?指导员是死是活?部队有没有人指挥?电厂的警卫和抢救工作怎样?哪怕多拖延一分钟,带给国家和上海人民的都是巨大损失。这时我想起团首长交待任务时说的话:“杨树浦发电厂的供电量占上海供电量的80%,只要这个厂机器一停,全上海就会变成一片黑暗,工厂停工、交通堵塞、自来水断绝供应、工业生产遭受重大损失。所以,它是敌人破坏的重要目标。这个任务交给你们九连,在任何情况下,都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它!”就在这个时候,我听到了一个微弱的声音:

“副指导员,电厂……”原来,通讯员小李和我压在一起。

救人救火

不一会儿,同志们用铁锹把我们从废墟中扒了出来。这时,只见发电厂被浓烟烈火笼罩,水管的爆炸声响个不停,残留在锅炉中的蒸汽,也不停地从被炸开的裂口迸发出来。愤怒使我忘记了伤痛,我在同志们搀扶下站起来,指挥部队严密地警卫现场,同时令其他同志带领工人抢救受伤人员、扑灭烟火。战士们听到命令,立刻出动。二排长刘顺怀带领一个组在废墟上奔忙。有的同志没有铁锹,就用双手扒开碎石瓦砾,抱出受伤和牺牲的工友。

我看到一位五十多岁的工人已遍体鳞伤,但还是不肯离开,他说:“我哪儿也不去,这里就是我的家。”当战士们坚持背他去休息时,他坚定地说:“你知道吗,咱们厂停电一分钟,光隔壁一个厂就要损失2000万呐。(按旧币)”

这时,六班长跑回来,他满脸焦黑,身上还冒着烟,声音嘶哑、结结

巴巴地对我说:“副指导员,人少,根本不行啊!”正在紧急关头,驻在附近的机枪连,七连、八连,各派一部分同志赶来抢救,帮了大忙。

又见灯光

战斗到晚上七点多钟,余火渐渐熄灭,受伤的工人和战士也抢救完毕。可是我已支持不住了,低头一看,才发现胸前有碗大的一块血渍。几个战士把我抬到隔壁国棉十七厂一个车间里,我饭也没吃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当我醒来时,已是第二天早晨。到了晚上,我伤情加重,被送进了医院。经医生检查,我的肺部受伤,一根肋骨骨折。这次空袭,全连共死伤18人,有3位年轻的战士献出了生命。

一天下午,连长董本旭来看我,我急切地向他打听电厂的情况。他说:“你放心吧,经过42小时抢修,那台发电机已经开始发电了。现在,工人和官兵们正在连夜抢修其他设备,很快就可以全部恢复供电了。”我听后高兴地握住他的手。



■ 赵瑞卿年轻时留影

作者简介

赵瑞卿,1928年7月出生于河北省盐山县(今海兴县),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1947年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,离休前系武警上海边防局副局长。

夜幕降临的时候,我俩走出病房,在大楼的阳台上,一眼看到了杨树浦发电厂矗立的烟囱,冒着滚滚的浓烟,整个上海闪烁着万家灯火,显得更加明亮、更美。我的内心充满了胜利的喜悦,上海,永远是一座不夜的城市。